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

Yuan Enzhen

Wenji

袁恩桢

文集



袁恩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袁恩桢文集/袁恩桢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第2辑)

ISBN 7-208-04908-4

I. 袁... II. 袁... III. ①袁恩桢-文集②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8600 号

责任编辑 虞信棠

封面装帧 杨德鸿

上海市社会科学学者文集

第二辑

袁恩桢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75 插页 6 字数 367,000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4908-4/Z·157

定价 42.00 元

本书由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
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袁恩桢,男,1938年3月28日出生于浙江宁波。1956年赴上海进上海财经学院读书(1958年,上海财经学院与华东政法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1960年从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系毕业,分配至该院的经济研究所,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一直至今。论著(包括主编与副主编)有《计划与市场》、《社会必要产品论》、《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问题》、《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改革十论》、《中国私营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经济概论》、《国有资产管理、运行与监督》等二十余种;各类文章500余篇,其中论文100余篇。有关论著曾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与论文奖。1986年获国家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被评为研究员。1987年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1~2001年任所长。曾兼任上海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计划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院长等职。1989年后,曾先后出访美、俄、日、新加坡、韩、奥、法等国以及香

港、台湾地区,参加有关国际学术会议。1995年11月,在莫斯科获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称号。现为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市仲裁委员会委员。

自序

作为上海经济理论界的一员，市委宣传部希望我能编一本集子。当然，只能是雪泥鸿爪，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痕迹。

论文选，难选的是自己的论文。不是“文章总是自己好”而难以割舍，主要是由于在渐进式转轨时期，改革理论的探索不只先于实践，有时还常常滞后于实践。回头看一下自己过去的文章，明显有许多不足与缺陷。不过，理论的探索与转轨就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中国经济学人也难以超越时代的局限性。

重读这些文章，犹如展开一页页难忘的改革历史。

放在首篇的《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一文，可以说是典型的“命题作文”。那是在1979年12月初，《文汇报》理论部主任来电，说是报社总编希望我能写这篇文章，是上海参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全国性大讨论的需要。约稿来电已是下午，接下来是理点手头上的资料，晚上回家写稿。那时还没有电脑，只能用稿纸书写，直写到午夜三点，完成七八千文字书稿。第二天一早送报社审稿排版，第三天见报，社会反映可以。可见，“命题作文”有时也有其需要，这里的关键是要有知识积累，要有自己观点，更要有一种激情。

《经济细胞和经济改革》一文，是参与雍文远教授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一书的副产品。1983年春，我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孙怀仁教授去京，参加全国“六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这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第一次全国规划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共中央党

校、黑龙江大学、四川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一起，同时取得了研究与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规划任务。上海经济研究所是集中了研究理论经济学的主要力量，花了整整两年时间，最后以《社会必要产品论》之书名，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说中国改革开放理论作出了新的有益的探索，并因此获得了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理论著作奖。我的那篇文章从一个侧面讲述了此书的基本思路。

《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看似一篇纯概念性的文字，却完全是有感而发。邓小平论计划与市场都是方法、不姓资不姓社时，为的是冲破对市场经济僵化的传统认识。但此后却有一些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名义下，以“方法”为幌子，竭力为走私贩私、贿赂买卖、偷税漏税等违法与腐败活动作辩护。文章是要讲清，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一种以不同经济利益主体存在为前提的经济关系。而作为方法也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谈得上。此文写出了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与看法。

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后，我所关注的一个重点。《摆脱两个滞后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一文，反映了我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观点。文中认为，国有企业的当前困境，源于改革的严重不到位。即使是已经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甚至是一批上市公司，由于政企分离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企业仍难以成为充分自主的市场经济主体。也正是由于改革的严重滞后，引发了企业发展的滞后，即大批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优势，几乎是丧失殆尽。结论是要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市场竞争力的自主主体，必须在政企分离的改革上下大决心，在企业发展上下大功夫。

《温州模式的启示》一文，选自 1987 年出版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一书。1986 年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自己定题，组团 10 人，前往温州考察。当时，由于温州模式的发展正遭到

有关方面的重重责难,却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调查机遇。市长接见,各部门、各企业的诚心接待,无保留地提供多方面资料,使我们能在一个月顺利完成调查任务。回上海后,既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信息交流会上,向社会发布温州模式的考察信息,又为多家报刊提供考察报告与随见,最后还写成一本当时属最完整研究“温州模式”的专著。这一项目的研究及其成果,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调查到最后专著成稿,前后三个月,选题适时,人力集中,精力集中,时间集中,是这个研究项目成功的基本保证。

1980年底,我参加上海市经济学会考察团到了深圳、珠海,目睹特区建设初期的状况。此后,我的调研足迹又涉及西南、中南、西北等地,包括围绕“西部大开发”所进行的一些考察,当然,更多的还是对我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上海包括浦东开发的调研与考察。这里选取了其中的几篇报告与随见。

上海市经济学界长期来保持了一种相互切磋、互敬互重的良好学术氛围,我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长期来更是以老青携手、各展所长、集体攻关为重要的研究特点。我得益于这一优良的传统与氛围。这本论文集的成果,也是上述传统与氛围的结晶。从而,我得感谢扶持我走上科研之路的雍文远、王志平教授以及已故的王惟中、孙怀仁教授,更要感谢上海经济学界的许多师长、朋友与同事,他们在不同时期对我的学术、工作与生活,都有过积极的指导和帮助。

袁恩桢

2003年7月于浦东寓所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编 经济制度断想

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3
是后退还是前进	
——从苏联新经济政策到我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 ...	13
私营经济的问题、认识与对策	25
爱建公司应恢复私营企业面目	30
论渐进式改革伴生的矛盾和问题	32
扩大内需与国内市场	42
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断想	53
基本经济制度的伟大创新	64
毛泽东的经济改革观	79
论陈云经济思想的基本特征	89
从方法论上把握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本特点	98
风雨探索四十年	105

第二编 市场经济研究

扎根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中

——学习陈云同志的经济理论笔记	115
-----------------------	-----

论指导性计划	125
经济细胞和经济改革	133
商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141
不能无视商品拜物教的存在	149
社会主义不能侈谈公平	152
在继承中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160
市场经济首先是一种经济关系	171
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经济基础	177
双重运行机制与公有制经济的活力	189
论公有制的质的规定性	20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统一体	212
葡萄酒、工人视察员及其他	221

第三编 发展思路探索

温州模式的启示	233
特区行	254
十年发展 启示深刻	267
浦东开发中的八大关系	272
浦东开发的八大经济效应	280
上海工业发展与市场的关系	291
九十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思想轨迹 ——论邓小平与上海经济发展	298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回顾与展望	307
从扩散到复归 ——论海外“宁波帮”的运行轨迹	319

西部大开发中的八大关系	324
西部大开发的环境保护	336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	340
多元化发展的中国经济	348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358

第四编 国企改革思考

法人产权与企业改革	371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历程与经验思索	387
抓大放小,扶优并弱	
——上海国有工业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思路	396
中国股份公司治理机制中的几个问题	404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伟大探索	411
加速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层思考	423
摆脱两个滞后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433
南方谈话以来的国企改革	445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几个认识问题	458
有关发展经营者市场的几个问题	467
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476

第一编

经济制度断想

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受到各方面的普遍重视和关心，认为这一讨论十分重要，它将进一步明确经济工作的指导原则，对我国经济生活必定会发生巨大的影响。但是，也有的同志这样说：“社会主义已经搞了三十年，难道连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还会不了解？”有的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搞生产，当然是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我们天天搞生产，总是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有啥好讨论呢？”这些看法说明，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讨论的意义还没有弄清楚。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经济领域的必然继续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总结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所必然提出的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程中所碰到的而且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讨论和弄清这个问题，是经济领域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流毒的需要，与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有密切的关系，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本文原载 1979 年 12 月 10 日《文汇报》。

问题讨论的必然继续。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一年多以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是也经历了一个从不认识到逐步认识，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发展过程吗？开始，不是也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常识，是哲学的 ABC，是理论界的事，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吗？结果如何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这场讨论，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精神枷锁，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促进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思想上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扫清了道路，正在日益显示出它的深远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正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经济领域的继续。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系极大，无论是对于经济理论界，还是实际经济部门，无论是对于国家的计划机关，还是基层生产企业，都具有极重要的普遍意义。

当我们开始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回顾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的历史，有多少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1952 年到 1957 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128.6%，平均每年增长 18%；农业总产值增长了 24.8%，平均每年增长了 4.5%；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52%。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当时的工作比较谦虚谨慎，比较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努力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原则考虑和处理问题，注意在生产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既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促进了生产的均衡发展。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1958 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高指标”，“浮夸风”，“共产

风”，“穷过渡”，到处风行。“以钢为纲”的口号成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事实上也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于是，钢铁生产变成无限重要、无限需要的东西，似乎生产钢铁就是一切，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却完全被忽视了。其结果如何呢？比例的严重失调，经济的严重破坏，给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很快觉察到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我们着手纠正，60年代前期果断地采取了周恩来、陈云等同志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降低了高积累，压缩了钢铁生产指标，注意了农业的恢复和轻工业的发展，因而，很快地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又有了新的起色。但是，由于“以钢为纲”的口号的影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明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因而未几何时，又重新出现了比例的严重失调，甚至使国民经济一度濒临崩溃的边缘。回顾三十年来波浪起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只要尊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经济就能比例协调，发展迅速；反之，不尊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经济必然比例失调，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即能发现，干扰主要来自“左”的错误思潮。什么“穷过渡”；“以钢为纲”，重重重重；高积累，低消费；搞生产是“为革命”，谈生活是“福利主义”；只讲产值、速度、高指标，不顾品种质量和人民需要，等等，这一系列经济工作中的“左”的口号和做法，严重地违背了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究其根源，主要是由于违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而引起的。林彪、“四人帮”更是蓄意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流毒深广。长时期来，这些“左”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

无论是经济理论部门还是实际部门，无论是领导机关还是基层企业，都不可以低估。为了彻底清除“左”的影响和流毒，努力按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就非要首先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个问题不可。

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迅速调整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以便为新的长征奠定扎实的基础。半年多以来，尽管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总的说来，遇到的矛盾不少，进展不大。这是为什么呢？原因是人们对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状况，是否比例失调，失调的程度如何，没有取得真正完全一致的看法，而看法之所以不一致，就是因为没有弄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尽管各部门都说要调整，但几乎都认为是短线，短线帽子争着戴。如果都是短线，还有什么可调整的呢？因此，究竟是失调还是不失调，是长线还是短线，只有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才能予以鉴别。譬如说，目前轻工业产品，如家具、纸张、肥皂、洗衣粉、皮鞋、自行车、缝纫机、粗纺呢绒、丝绸被面等，长期紧张，许多日用小商品，特别是广大农村盖房用的元钉、铁丝和建筑小五金严重供不应求；另一方面，钢材、机床设备等重工业产品却大量积压，数量惊人。一方面，生产是在不断地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发展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11.2%；另一方面，广大职工的工资水平却很少提高，实际工资甚至有所下降。一方面，大批建设资金投向重工业，特别是投向偏僻山区，难见成效；另一方面，沿海老工业区，特别是一些轻纺工业，建设资金严重缺乏，厂房设备陈旧，“三废”严重，劳动条件很差，有的甚至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面对这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经济情况，难道还能说当前我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不严重吗？难道还不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调整吗？因此，只有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分析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才能够对调整工作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有一个统一的认识。